

遥》，邢益海《从<养生主>看庄子的生命政治学——<养生主>关键词新解》，黄钊《庄子返朴归真的道德追求及其修身方法探析》，刘韶军《老子思想中的辩证思维》，黄梓根《论老子仁的境界》、翁频《浅议<庄子>中的怪物》，路传颂《“道”与“自我”——庄子思想的一个侧面》，白奚《<老子>四十五章“躁胜寒，静胜热”释义新探——以郭店竹简本为依据》，吴根友《简论<齐物论>多元主义的真理观与包容主义的价值观》、李明珠《老庄“隐逸”思想辨正》、黄新华《<道德经>的去战思想和民本情怀——论<道德经>的太平思想》，于占杰《论老庄哲学对主体性问题的探索》等 2、解读老庄的方法论问题。张松辉《从矛盾的角度来理解庄子思想》，认为《庄子》多有矛盾之处，研究庄学必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即从矛盾的角度去分析、理解庄子思想。尹振环《老子能否“以古为尚”？》提出对《老子》的考证能否“以古为尚”的问题。陆基洋《概念隐喻理论应用于中国哲学研究之商榷——以斯林格兰对老子无为的诠释为例》以斯林格兰对老子无为之诠释为例，说明应用近代认知语言学中概念隐喻理论作为诠释中国哲学文本的架构可能存在的不足。陈丽桂《<想尔>解老》则是利用老子思想阐述作者对《老子想尔注》的理解，方法新颖独特。3、利用出土文献深化老庄研究。这方面的论文不多，主要有丁四新《郭店竹简<老子>校考中则》，日本西山尚志《关于郭店楚简<老子>三本、<太一生水>的抄者——字形种类的统计分析》，张丰乾《孙星衍<文子序>辩证——兼及<文子>诸本的著录和异同》等。4、关于老庄思想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如：吕锡琛《论老庄的心理保健智慧及其现代启示》，通过对老庄所倡导的顺应自然、祸福相倚、致虚守静等人生智慧的阐释，对当今社会许多心理问题给予启示。胡孚琛《道学文化的新科学观》，提出道学心、物、能一元论的新科学观，而 21 世纪的新科学是整体的科学，是揭示宇宙、生命和心灵三者“大统一”规律的科学，这种新科学实际上即是新道学。汪森《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渊源——庄子思想及其与当代音乐美学这理路》认为庄子思想实为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之渊源。

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韩国金白铉《<庄子>中几个诠释问题》，欧崇敬《<逍遥游>的超解构哲学》，周晓露《论老子的“化而欲作”思想——西汉前期社会走向对“化而欲作”思想之印证》等。

本次研讨会聚集了海内外道家道教研究领域的众多方家，既有我国道教学术界老中青三代学者，也有道教界人士，以他们的亲身体验来研究道教义理与戒律，标志着此领域研究人气兴旺，后学有继；研究范围较以往更加广泛，视角多样，涉及义理、人物、艺术、历史、信仰心理等多方面，标志着道家道教研究宏观微观并叙，正由粗转细，逐渐深入。

（作者于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编审）

宗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

——第二届基督宗教商业伦理与管理学术会议综述

陈建明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第二届基督宗教商业伦理与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本

次会议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以及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和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会议的宗旨是: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督宗教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商业伦理在基督徒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会议论题有:基督教领导伦理、《圣经》与基督教伦理、基督教伦理与管理实践、基督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基督教经济伦理和商业伦理等。与会代表发言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一、宗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梁燕城认为羊道也是人道,以人为本,且重视万物和谐共存。羊道文化是西方精神文化的基础,是西方现代文明成功发展的根源。由此勾画出人性以羊道为根基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美好蓝图。成穷认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在人与自我关系的问题上,宗教反倒倾向于采取斗争的立场,通过深刻的反省、艰苦的磨炼与神恩的佑助,方能战胜各种诱惑与罪孽,最终达到“成仙”、“成佛”、“成圣”的完美境界。在人与人的相处上,宗教大多不主张争斗,具有明显的和平倾向。宗教不主张争斗的态度有其合理性。就人对自然的关系而言,这种态度显然有利于人对自然的保护与资源的节约。林庆华通过分析霍伦巴赫是怎样思考当代天主教人权理论的梵二会议背景的事实,阐释了天主教对人权理论的整合的、包容性的理解,并简明地说明了该理论对维护受压迫者的权利的意义。

二、基督教经济伦理与商业伦理

林洁珍认为:如果说现代自由经济主义的毛病是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的规律及私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话,那么很多现代的基督教伦理学者却是犯了相反的毛病,就是对市场规律和个人的责任重视不足。基督教伦理与自由经济主义,不一定要彼此矛盾,而是可以互相补足,和平共处。白虹提出,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人格尊严原则来源于基督宗教对人的认识,这个原则要求尊重人的统一性、个体性和超越能力,尊重人的自由,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要从人的存在的高度理解人的社会性。就经济活动而言,人的经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却不能仅仅以其本身为目的,还要关注经济活动的道德意义。卫东海认为明清经济狂飙般崛起的动因与韦伯反复引用富兰克林的思想以阐释宗教精神确有诸多共性的东西。刘平通过分析田野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性以及论证问卷调查的一般信息和方法论,提出“信仰和工作可以与金钱并存吗?”的不是结论的结论。陈才俊指出:新教伦理虽然鼓励人们获取财富,但是反对非理性地获得财富。新教信徒不能容忍有悖新教伦理与商业道德的商业行为,厌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富。美国传教士之所以反对鸦片贸易,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贸易有悖于新教伦理的商业道德,会严重破坏福音在中国的广泛传教。

三、基督教伦理与管理实践

李向平认为,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既是一个宗教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亦是宗教理念如何进行社会实践的现实问题。多年以来汉语学术界以“儒教伦理”、儒教资本主义替代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讨论,实际上是悬空了新教伦理的行为规范和实践意义,忽略了新教伦理的制度实践特征。因为儒教信仰是一种缺乏宗教制度的信仰形式。因此,新教伦理与中国近十年来兴起的基督徒企业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基督徒企业作为一种“职场事奉”和“职场教会”,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表达和实践新教伦理的组织基础,并在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职场性新教伦理”,进而呈现了一个信仰群体的行动规范,真实体现了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具体关系。陈声柏以兰州一个普通基督徒企业家为例,来展现现实层面基督徒企业家的商业伦理现状及其遇到的问题,进而尝试回应

韦伯的经典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现实中国基督徒企业家身上的体现及其差异。他在最后提出：“到底是企业通过福音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呢？还是福音通过企业获得更大的传播？还是两者合二为一？这似乎还是一个问题。”潘兴旺介绍了浙江省基督教两会举办首期基督徒商业伦理培训班的情况。

四、基督教领导伦理

司徒永富阐述了基督教伦理思想支配下的企业领袖个人人格魅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提出：“无论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做生意都要遵守规律，所以做基督徒也要看风险。企业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体社会利润。基督徒要讲圣洁——公义——慈爱。……不强加信仰，做生命的见证。”单元庄特别针对基督教在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组织神格化”的功能形态以及特征与精神，引申出了他所创建的“组织人格化”理念和“组织人格学”体系。他认为在现代组织中，个人的品质、个人的要素很重要。领导占有了主导资源，因而其作用有时比民众厉害。他不否认民众和制度的作用，但认为制度是人格的制度化。徐杼颢列举了三种仆人式领导模型，认为仆人式的领导理念符合建立教会目的需求及吻合中国推崇的君子之风范，教会领导的爱神和爱人的心影响着信徒在教会的属灵或属世经历。他强调了“仆人式领导”在教会和职场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王东结合圣经中耶稣谦卑的神格和人格理念，梳理了“仆人式领导”的由来，对当下大陆商业企业领导模式的改进进行了伦理方面的反思。他认为基督教仆人式领导的意义一是有利于避免商业活动中人的异化现象，二是有利于维护商业伦理，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五、《圣经》与基督教伦理

姜宗强通过分析《阿摩司书》中有关财富的经文段落，得出结论：财富应该正当获得并使用于使人获得自由、独立的有益事业中；而不应该通过奴役抢夺他人而获得，或者使用作为奴役他人的手段。谢伊霖认为雅威的威严要求正义与信德并行不悖，这也是整个基督信仰一以贯之并加以持守的，从而在此基础上引发出一种宗教伦理意义上的思考。毛丽娅指出，《圣经》承认基本的财产权，主张通过敬畏上帝、勤劳、智慧去获取财富，反对那种忘记了上帝而对财富的追逐，强调财富只有用来事奉天国和帮助同胞时，才是值得赞许的。《圣经》重视慈善，主张对那些没有能力获得财富的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照，要求信徒周穷救急，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贺璋琰以《雅歌》为例，认为圣经中有诸多宝贵的关于婚姻伦理的论述，旧约和新约时代的人们的婚姻生活虽然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从《圣经》中的字里行间人们还是不难体味到其对婚姻的神圣意义的理解，不难发现其对爱情与婚姻的一种既现实又合理的灵活态度，从而使我们在对现代人的婚姻进行反省和审视时有了某种“超越”的眼光。

六、其他论题

高喆指出，单方面强调与上帝“合作创造”的人类工作是一种僭越，它将工作的外在成果置于工作之意义的核心，却忽视了其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合作创造”，而是享用上帝丰富的礼物，并在感激之中将其慷慨地赠予他人。视人类工作为“礼物的回赠”，意味着上帝关注的是回赠这一行动本身，而非工作成果的多少。陈建明与程洪猛以社会调查为基础，通过阐述泸州教会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所在社区和捐助者的关系，指出泸州基督教会社会服务事工所取得的成绩与正确处理教会与外部种种关系是分不开的，进而提出了对教会公共关系的定义并思考其意义所在。王蓉基于分析

保罗·尼特的“相互关联和全球负责”的宗教伦理实践方案，反思基督宗教信仰，肯定了保罗·尼特在为人类走出生态灾难困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张秋梅通过讨论在具有父权统治色彩的思想文化体制下的女性和大自然是如何遭受虐待的角度，来探悉当代女性主义神学家萝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萝特不仅批判传统基督教的父权制和二元论思想，也深入分析了对女性和自然受支配的关联，而且还积极提出了解放妇女和自然的构想。

（作者陈建明，1953年生，“四川大学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骨干、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院、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协办的“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谐社会中的法律制度与宗教”，于5月31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越南、老挝、新加坡、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挪威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宗教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国际关系、行政及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专家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及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宗教团体的代表等近百人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开幕式上致词。他说，各国宗教管理方法及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会议触及的宗教管理立法，宗教与公民社会及公共生活，现代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新型宗教的多元发展等议题，也是当前学术界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作为一次跨学科、跨文化的中西方学术对话，与会者围绕“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政教关系模式比较”、“宗教与基层自治”、“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各国宗教立法比较”、“宗教团体的财务管理”“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的途径”、“宗教与公共秩序”等议题展开对话与讨论，涉及的范围包括各国关于宗教的法律法规比较、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关系、政府管理宗教的模式以及宗教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者介绍了各国在宗教与法治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的不同特点和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当代社会与国际事务中宗教是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宗教与法治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各国法学、政治学、宗教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人类社会要有信仰，现代国家离不开法律。国家要处理好与宗教的关系，就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完善宗教立法、依法管理宗教、发挥宗教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只有处理好宗教关系，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宗科）